

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渊明之间的师承关系初探

曾安源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与外语系, 湖南 衡阳 421005)

[摘要] 历尽了人生的坎坷,看破了世态炎凉,苏轼用诗人的心灵感悟陶渊明的平淡放达,也用诗人的语言准确地诠释了陶渊明的思想情感,故尔虽隔六百载,两位诗人的心灵却是一脉相通。文章试从人生经历、个性感悟和语言特点分析陶苏之间的袭承关系。

[关键词] 苏轼; 《和陶诗》 袭承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2-0079-04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1]苏门文人黄庭坚在《跋子瞻和陶诗》里一语中的,十分精确地揭示了陶苏之间的隔代神交关系。千载难寻的陶彭泽与百世一遇的苏文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演绎了一段六百年神交的文坛佳话,让后世敬重陶渊明和钟爱苏东坡的士人莫不高山仰止,望文兴叹!

一 《和陶诗》的写作背景

苏轼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这种追和古人的诗歌在苏轼的文学创作中别具一格,即便在中国诗歌的长河中,也是别开生面的一朵瑰丽的浪花。苏轼最早的《和陶诗》作于元祐七年的扬州任上,即《和陶饮酒二十首》。然而人生升沉起伏,政坛风云变幻,苏轼先贬岭南,再贬儋州,渐行渐远,远贬天涯海角。在闲暇无赖之时,在意气融泄之际,他细细品味陶诗,一一追和,积一百零九篇,自辑成集,还请弟弟苏辙写引。苏轼自称:“吾于诗人,无甚所好,独好渊明之诗”,自觉得意之处“不甚愧渊明”^[2],足见苏轼对和陶诗的偏重。而这些清平淡泊,似癯实腴的诗作实在与苏轼的人生遭际、思想个性、年龄阅历、生活状态有着深刻的关系。在这些方面苏陶之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

(一)人生遭际的基本相似

“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清诗。赋归来之清引,我其后身盖无疑。”^[3]苏轼将自己拟为陶渊明的后身是颇有深意的,因为两者的身世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翁在少年时由于家庭和儒学的影响,青年时代就有“大济苍生”的壮志。“意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4]。然而由于晋代门阀制度等级的森严和政局的不断动荡,陶渊明的远大抱负和横溢的才华无从施展,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仕,亦不过祭酒、参军、县令之类,志无所申,反倒降

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逶迤周旋,感觉是“误入尘网”。在老庄思想和隐逸世风的影响下,他早就产生了隐逸志趣,后来在彭泽任上,适逢督邮来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迎接,于是,他仰天长叹:“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而归,坚决走向了田园。晚年,晋皇室征召他为著作郎,檀道济也曾劝他出仕,都被他“麾而去之”,他采取“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不受皇恩官惠,洁身守志,完全超脱于现实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晚年亲自参加劳动生产,彻底冲破了剥削阶级意识,表现了与劳动人民的亲近,自觉培养与下层劳动人民平等的思想。在自耕自足的生活中,他常常受饥寒威胁,有时甚至乞食,这就不得不使他从别的方面探求贫困原因,因此他提出桃花源般理想社会也就不足为怪了。

六百年后的苏子瞻,少年聪慧,家学渊源,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轼二十出头名动京师,才折文坛领袖欧阳修,文惊大宋仁宗皇帝,被皇帝与文坛泰斗许为奇才。自古英雄多磨难,与陶渊明一样,才情飞扬的苏轼,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有耿直敢言、是非分明的个性,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乌台诗案”,苏轼被贬黄州;元祐党争,远谪岭南;某些政敌尤以为不够,令一贬英州,再贬惠州,复贬儋州,将他贬谪到中国的天涯海角了。苏门弟子陈师道感叹道:“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投荒忘岁月,积毁高城垒。”^[5]苏轼的一生,其跌宕曲折,似与陶渊明也相差无几。

(二)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

令人惊奇的是,苏轼在四十年的政治磨难中,竟能把儒家的“穷独”、佛家的“出世”、道家的“遁世”如此和谐的融会贯通,而且从中生长出一根精神支柱,在苦闷中觉悟欢乐,在失意中寻求解脱,逼使自己承载着破碎的理想,永远保持豁

[收稿日期] 2008-12-02

[作者简介] 曾安源(1962-),男,湖南祁阳人,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外语系高级讲师。

达洒脱、随缘自适、超越自我的心情,也就催生了他旷达的人生态度。旷达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对国家贫弱的忧心,对百姓疾苦的关切,对君主的耿耿忠心,以至于不避一生的祸福的品质,展示着苏轼的一面:儒士、忠臣。但后来我们却看到另一个苏轼,他一生屡遭打击,好几次差点送命,可以说失意太多。不过穷困潦倒之际,苏轼又把挫折与失败的悲痛浸泡在佛家“人生就是苦难”、“出家人四大皆空”和道家的“顺应天命,顺应自然”这两坛药酒里面,酝酿出了苏轼那独特又让后人称道的个性化人生。《赤壁赋》中“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和陶渊明的“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不是在精神上一脉相通么?!

陶渊明出生于晋代一个典型的封建仕族家庭,从小受到儒家、道教的深刻影响,这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必然。他的少年时“猛志逸四海”就充满着儒家的进取思想,晚年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又可以看见道家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顺应天命的深深印记。笔者以为兼收并蓄的陶渊明对从汉代传入中原的佛教一定是颇有研究的,他的内心深处也一定打下了儒、道、佛烙印,从而成为苏轼的隔代宗师。

(二) 年龄与阅历的锤炼

根据论陶专家袁行沛先生考证,陶渊明在晋代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五十四岁那年的秋八月任彭泽县令,为官八十余日,至十一月,作《归去来兮辞》归隐,他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6],这一举动,是陶氏一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他或曾因为养家糊口,迫于生计,涉足官场;或碍于情面,由亲戚荐引,做过幕僚;或因达官征辟,入于幕府,但因靖节之性,廉洁之心,怜悯之情在仕途挣扎。“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能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7]然而,陶公虽有“猛志逸四海”,可行役奔走之苦,被人颐指气使毫无自由之际,更兼鞭笞黎民不忍,使他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中彷徨,心中产生“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的归隐之思就顺理成章了。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心态恬淡而自然,终日“引壶觞以自酌,眈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8]。虽然,陶渊明晚年也曾陷于贫困,可是早已看破红尘,习惯了清贫生活的他,再也不会将暂时的困苦当作磨难,有时反倒产生一种从未遭遇过这种生活,而希望品味这种生活的诗人灵感,《乞食诗》就是这样诞生的。苏东坡在《书渊明乞食诗后》注曰:“渊明得一食,至欲冥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类。”^[9]类丐者,非真丐者也,也就是偶尔断顿挨饿在陶渊明身上也发生了。然而,陶渊明对权贵檀道济的馈赠,和对民间“谐余意的主人”的招待,态度迥然不同,足见陶氏只愿过无拘束的自由生活,而不再想与官场发生任何联系——宁可乞讨,不愿折腰。

苏轼的晚年,在经历了死亡的阴影,经历了两次起落,甚至一月内三次贬职后,对人生的感悟,对官场的认识,自然十分深刻,因此,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之际,当自己成为“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发萧索满霜风”时,毫不为念,因为他知道“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10]。孔

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先贤的遭遇,肯定是苏轼赖以吸取经验的对象,所以当人生的不如意再次袭来,苏轼能从容应对,毫不惊惶:南迁惠州,仅携朝云和苏过;再徙儋州,更只有幼子苏过相随;到儋州后,由于政敌和地理的双重原因,折支券总也得不到落实,就是太守张中对苏轼友善一些,亦被章惇等朝中权贵找借口调离;然而,苏轼不怨天尤人,除杂念,惜光阴,意寄笔端,将此次遭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浓缩成一首首和陶诗,“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11]。佛家修炼的空灵境界,道家讲究的顺应自然,陶公追求的自由闲适,和苏东坡的安适超脱豪迈,正是内心一也。

二 《和陶诗》与陶诗的袭承关系

“少时学语苦未圆,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清代著名诗人赵翼在总结自己学习诗歌创作时十分深刻地指出,诗歌创作不在乎绞尽脑汁,尽搜枯肠,而在于深刻的生活积累和创作中不断吸收古人的营养,才能达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晚年苏东坡由于自身文学天赋和丰厚的生活积累,集几十年诗歌创作经验于一身,推出了非同一般为文造情的唱和之体,而是体现诗人肺腑之情的《和陶诗集》。

既是和诗,自然就与原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的《和陶诗》对陶诗袭承关系主要表现在“承形袭制”、“承言袭格”、“承心袭意”三方面。

(一) 承形袭制

既然是追和之作,首先就是对原诗外部形式的袭承,也就是说完全依照五言诗的句子,以陶渊明五言的原韵和原来的句数追和。陶渊明生活于东晋,正是五言诗成熟的时代,故他的诗歌皆为五言。六十二岁时苏轼贬岭南谪海南,虽说不是万念俱灰,在他心中料定此生北返无望了。诗人仅携带陶诗渡海,落寞时潜心细研,由于思想、经历、年龄上的契合,苏轼觉得自己在心灵心境上与陶渊明毫无二致,纵笔之际,陶翁就成了当然的师范,更何况五言也是苏轼的强项,信手拈来,游刃有余,其追和的陶诗共一百零九首,皆依陶翁五言,依原来的句数和原韵脚,甚至每首诗歌的标题也是照搬陶诗原来的标题,完全继承陶诗的衣钵,承袭了陶翁的外部形制,丝毫不爽。

(二) 承言袭格

所谓的“言”和“格”指的是诗歌的语言风格。诗歌是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诗人总是用最恰当、最精确、能表达最丰富的意义的字词来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感,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语言风格则表现在诗人整个诗歌作品或一部分作品上,或称之为豪放,或称之为婉约;或叫它沉郁顿挫,或叫它慷慨激昂;或以清新明丽令其和华丽绮靡相区别,或以风骨与柔媚相分野,以此而形成诗人各自不同的创作特点。

苏轼在黄州时就对前代诗人白居易、陶渊明仰慕备至,“东坡”之号就源于白氏忠州东坡,并且也是在黄州时就因躬耕其地而“欣欣欲自号‘麀糟陂里陶靖节’”^[12]。晚年的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活又是黄州生活的继续,只是当此之时,

随着年事日高,对佛、老的研习染指更深,看破红尘后,反倒更加胸无芥蒂、一任自然,所以苏轼说:“东坡先生谪僇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藟芋,而华屋玉食之志不存于胸中。”^[13]由于日日研读,苏轼深得陶诗三昧,他也会自得地对苏轼说:“吾于诗人无甚所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对陶诗玩味欣赏更加深刻,“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十数篇,至其得意,自谓不愧渊明”。苏轼深以兄长之心为意评价说:“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晚景,自托于渊明”。^[13]平常我们说兄弟情深,苏轼对兄长学习陶渊明的风格是十分了解的,所以子瞻和后子由再和,亦步亦趋,就是对兄长《和陶诗》的衷心赞同。明代评论家王方直诗话载:“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园田居》六首,乃与渊明无异。”^{[14][10]}事实上,晚年的苏轼语言风格亦步陶韵,趋于平淡,他也想象陶翁那样用最简单、最质朴、最准确、最符合当时毫无怨怒之气心情的字眼来表达自己丰富、复杂、恬淡、旷达情怀。《和归园田居》六首是苏轼的上佳之作,在这六首诗歌当中,每一个字都是常见的字,排除了生僻、古拙,每一个句子都是淡雅平和,毫无刁钻古怪、诘屈聱牙的故作高深或者是“掉书袋”。苏轼写道“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春江有佳句,我醉坠渺茫”。如此“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意境高远,气韵清新的语言风格,与陶公《归园田居》中“种豆南山下,草深豆苗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浑然忘我之境十分融合。

所有《和陶诗》语言洁净淡雅,正是苏轼学习陶诗的心得。从僇州遇赦北返,苏轼在告诫子孙学习写作时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15]《和陶诗》就是苏轼追求“平淡”的典范之作,只不过和诗在内容上不受陶诗局限,仅以陶诗原韵、原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罢了。《和陶诗》不同于一般的为文造情的唱和,而是诗人的真情实感,肺腑之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苏轼的《和陶诗》,只是借陶诗的“皮”,借陶诗的“格”,在相距六百年后,让自己的心灵和陶渊明先生的心灵擦出了火花,他继承了陶氏对生活的心态,用心在诗的境界中与前辈交流,仿佛时空隧道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闸门,让他们相遇、倾吐、唱和,畅谈敬仰和爱惜之情。金宋间诗人元好问在《陶诗集序》中说:“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说;又有‘学至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后,乐天香山后,东坡南海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14][139]}苏轼的《和陶诗》也是从“技”进于“道”,是从写诗到吟诗,从着意雕饰到水到渠成,从学习模仿到心有灵犀的自然进化!

(三)承心袭意

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苏轼的《和陶诗》的写作背景与陶渊明的创作背景有许多相同之处:二人人生的遭遇十分相似,同受道教、儒教、佛教的影响,晚年生活都是平淡却也自给自足。苏、陶二贤的晚年心气十分平和,他们对生活、

对官场、对挫折与磨难的认识已到了随心所欲、无怒无嗔高僧大师境界。古人云:“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晚年的苏轼,心中可包容万物,眼睛可接纳宇宙,故而能够一扫年轻时的盛气凌人,咬文嚼字,卖弄才华,转而向枯淡贫瘠中寻求寄托,因此诗的风格和情感的抒发,弥漫着一种平和、隽逸的气韵,让人感到这样两位慈祥的长者有如老僧入定,精神脱壳般的静虚,真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静观天空云卷云舒”。

陶翁晚年或“登高以舒啸”,或“临清流以赋诗”,有时采菊东篱,有时垂钓柳下,就算身居闹市也能“心远地自偏”。他流连的是清涧明月,徜徉的是疏荒荒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乘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他无心凡尘俗务,心中有真意,也“欲辨已忘言”。苏轼贬惠州、海南后,或流连总角,与天真的孩童嬉闹,行舞雩之风;或与卖饼的婆婆玩笑,赠诗称人“春梦婆”;或与种荔枝的老农相约,树下畅谈年岁的丰足;喜闻琅琅书声,乐见烁烁垂果;也寻牛屎觅路,也扶杖藜偷闲,早年勃郁之气,已化为过眼云烟,所以在“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之地,“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潦倒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斗酒只鸡定燔吾”之际,“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之时,还可“酣歌饯华颠”,还可与老农“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不时因“春江有佳句,我醉坠渺茫。”^[16]其句意微妙,与“欲辨已忘言”异曲同工。

纵观苏轼的晚年,尤其贬岭南之后,其热爱陶诗的程度与日俱增,他携陶诗、读陶诗、和陶诗、括陶诗、品题陶诗,读陶诗而忘情,听陶诗而技痒,如此执着,如此痴迷,加上苏轼的文学天赋和哲学修养,怎么不会打造出第二个陶渊明呢?因此,心意相承六百年的两位神交,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妙境。难怪苏轼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师渊明之雅放,和百首之清诗,赋归来之新引,我其后身盖无疑!”又在《江城子》声称“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17]

妙哉,心意相通的陶靖节与苏文忠!

[参考文献]

- [1] 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348
- [2] 袁行沛.陶渊明诗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662
- [3] 苏轼.苏轼诗集·归去来兮辞并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96
- [4] 袁行沛.陶渊明集注·杂诗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3:374
- [5]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所.中国著名文学家评传·苏轼[M].海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225
- [6] 袁行沛.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460
- [7] 袁行沛.陶渊明集笺注·杂诗十二首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2:342
- [8] 袁行沛.陶渊明集笺注·归去来兮辞[M].北京:中华书局,1982:460

[9] 苏轼. 苏轼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795

[10] 苏轼. 苏轼诗集·纵笔三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327.

[11] 苏轼. 苏轼诗集·和陶读山海经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3327.

[12] 苏轼. 苏轼文集·与王定国书 [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2000: 438

[13] 苏辙. 苏辙散文集 [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1: 152

[14] 王友胜. 苏诗研究史稿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15] 何文煊. 历代诗话·竹坡诗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348

[16] 袁行沛. 陶渊明集笺注·和陶归园田居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629.

[17] 吕观仁. 东坡词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104

Hearts Which Have a Common Beat are Linked

——SU Shi and 《Poem in reply to Tao》

Zeng An- yuan

(Hunan college of Enviromental- biological polytechnic, Hengyang 421005, China)

Abstract Having experienced many vicissitudes of life and seeing through the fickleness of the world, SU Shi, using themind of the poet, felt and understood the common, unconventional and unrestra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AO Yuan-ming. Also, he, using the language of the poet, explained the thought of TAO Yuan-ming. So, though the time span between them was six hundred years, their mindswere intimately tied up with each other.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life, personality feeling and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features of languages, the author tr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between TAO and SU.

Key words SU Shi 《Poem in reply to Tao》 inheritance

(上接第 78页)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姚亚平. 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 [J]. 语言文字应用, 1995(3): 94- 99.

[3] 叶南. 论汉语称谓语的文化内涵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1(6).

Exploration on the Phenomena of Present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Uacancy in Chinese

KUANG La- ying

(Jin 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phenomena of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in Chinese and express the relationship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is a language phenomena which is related to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hierarchy.

Key words conventional appellation vacancy zero appellation pseudo relative appellation